

## 可贵的艺术成就 亲切的民族风格

——重读《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

李丕显

春光明媚，百花齐放。文化革命前极有影响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陆续与读者见面了。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是其中几部反映农村斗争的著名长篇。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开放的文艺百花苑里的这些奇花异葩，争妍斗艳，今天读来仍旧令人激动，令人感奋。因此，重新探讨一下这些作品的可贵的艺术成就、亲切的民族风格，对于肃清“四人帮”的影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会有所裨益的。

### (一)

在文艺界一场洗劫之后的今天，与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朝夕相处，真如重逢阔别多年的熟人，倍觉亲切。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往往关乎着一部作品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没有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它的重要人物形象是不具有典型意义而又栩栩如生的。《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这三部长篇，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组成了农村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的长廊，通过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出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农村革命斗争。《红旗谱》写的是大革命前后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北方农村的阶级斗争。如果说，作者是把朱老巩作为对我党成立前进行自发斗争的农民英雄的总结来写的，那么，朱老忠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农民的代表。他有着同老一代一样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但却走着同老一代不同的斗争道路。他从不懂得如何革命到接受党的领导，从只能把阶级仇恨埋在心底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一个人的经历蕴含着代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由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道路的共性。《暴风骤雨》是全国解放前夕写就的，对于反映东北农村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推动即将在全国展开的这场斗争，应该说，它是一本很合时宜的书。书中的赵玉林、郭全海等是这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为了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赵玉林的勇敢坚定，先人后己，郭全海的年轻干练，婚后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党的领导下，农民阶级又向前迈进了。到了《创业史》所着力塑造的梁生宝，已经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典型，全身心扑着集体化的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他的道路，代表着五亿农民的方向。从朱老忠到梁生宝，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农民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而每个人又都带着他那个时代的特色。

这三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仅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而且他们都是个性化的，是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的。朱老忠的性格是深沉的。他的血液里交融着历史的传统和时代的精

神。他走南闯北，阅历广，见识深。为朋友，他勇于两肋插刀；困难时，他坚信出水才看两腿泥。他稳重厚实，有“义侠”之风。他勇敢而又坚韧，严肃却又风趣。在反割头税运动和二师学潮斗争中，他表现得机智果敢，豪迈爽朗。跟朱老忠同时走上革命道路、同时入党的严志和，同朱老忠相比，不但在思想境界上大逊一筹，在他的成长中需要更多地摆脱小农心理的束缚，而且在性格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他勤俭耐劳，善良本分，温顺优柔；他说话不紧不慢，感情易于外露，不能自己；他又柔中有刚，遇到被逼出卖“宝地”，也是“瞪出眼珠子，牙齿铤得咯崩崩响”。大贵被抓兵，运涛入了狱，同样是遇到不幸，两人的表现就迥异：大贵被抓兵时，朱老忠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把拳一伸说：“去吧，去当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在咱也许认为是‘福’。我早想叫大贵去捋桃杆子，这正对付。”他的关于“一文一武”的谋虑，确实超出了小农的眼界。他又说：“我不服他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信心不可谓不坚。待到运涛入狱，严志和是头脑晕眩，骨架支不住身子，朱老忠把他搀回家去，后来又是老忠带着江涛步行去济南探监。两人性格大相径庭，全书处处可见。年青的一代，大贵是“一根筋”脾气，认准正理儿不回头，运涛则稳重寡言，时常闷头想事儿；张嘉庆性如烈火，猛如张飞，搞秋收运动，一轰而起，再巩固组织，严江涛文如处子，深思熟虑，领导反割头税，先组织群众，再形成运动。一人一个性格，一个性格一种方法。还有，春兰因向往“革命”而把这俩字用白色丝线绣到怀襟上，严萍单纯活泼，热情地奔扑着革命。贵他娘干脆利索，与朱老忠有些相仿，涛他娘温文多愁，跟严志和有点类似。在《暴风骤雨》中，同是贫雇农的积极分子，赵玉林的朴实忠诚不同于郭全海的年轻干练，白玉山从一个粘粘糊糊的懒汉一变而为成天脚不沾地，身不沾家，心里总在惦记着事情，自是另有一番特色。同是有些胆小怕事的老年人，老孙头乐观好唠，老田头口讷舌拙，他们的性格差异是何等大啊。即使是胆小怕事这样的共同特点，表现在老孙头身上，常是支支吾吾避开追问，唠起别的闲嗑岔开话题；还滑稽地自我辩解“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怕啥？”老实巴脚的老田头，起初是有苦不敢诉，后来在血泪控诉恶霸地主时，碰到地主的狗腿子耍手腕，又不敢再说下去了。《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跟有万、双喜等先进人物，也是既有思想境界上的差距，又有性格上的区别。这些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当然也不是一个脸谱。冯兰池老谋深算，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老地主的毒辣和贪婪，冯贵堂学过“法律”，竭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榨取利润，积累资本，又妄图用资产阶级的口号欺骗农民。韩老六阴险诡谲，杜善人面善心恶。在这些地方，作家们把不同的性格加以对比，把各个人物用彼此对立的方式鲜明地区别开来，越是共性相近、不易区别的人物，越是通过行动、语言、细节描写加以对比，创造了鲜明的个性刻画的成功经验。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页）这个评价和要求，《红旗谱》等优秀作品所塑造的主要人物，是能够称得上。

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方法上，这几部长篇小说较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极少作详尽的肖像刻画、静态的心理剖析和脱离情节发展的环境描写，而是以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画的细描相结合，主要通过一连串富有特征的行动、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前者通常使用简洁有力的叙述笔调，使得人物经过一连串的事故，粗线条勾勒他在“做什么”，后者则多用绘声绘形的描写、抒情笔调，通过富有鲜明性格特色的语言、小动作和声音

笑貌，工笔画式地细描人物在“怎样做”，突现人物的个性特点。你看，作者叙述朱老忠从东北回乡之后和乡邻穷友的一系列接触，用简练的笔墨，表现出他走南闯北，闯荡成那么一个硬汉子；而在大贵被抓兵这样的典型事件中，作者则绘声绘形地写道：

朱老忠觉得这些人未免欺人太甚，一时气愤，心上急痒难耐，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走出走进，说什么也站不住脚。耳朵里象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在叫唤他。走到门洞口，把手放在铡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他又犯了思量：“还是从长里想的好！”又走进屋里，坐在炕沿上，抽起烟来。抽了一袋，又一袋，沉思默想了老半天，把拳头一伸，说：“好！咱就是这个脾气，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去吧，去当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在咱也许认为是‘福’。我早想叫大贵去捋枪杆子，这正对付”。（第十三章）

在这里，人物的声音笑貌、神态风度、语言动作、心理变化，交融一起，既表现了朱老忠的个性特点，个性中又蕴含着人物的阶级属性。即使是工笔的细描吧，也不是由作者进行主观的静态的介绍和剖析，而是寥寥几笔，画龙点睛，使当时的情态跃然纸上，传神地突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几部作品比较起来，《暴风骤雨》更多地采用了“动画式”粗线条勾勒的白描手法，但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表现个性特点的点睛之处，也不乏工笔细描的笔触；《创业史》中对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则更重一些，——为了表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作家的这一探索和尝试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书中人物的心理动态往往是扣紧人物的具体行动，用“剧中人”的口吻，个性化的语言，把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成长过程突现出来。例如梁生宝买稻种中的一个细节：作者先写他如何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如何取出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包，如何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接着写道：

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

梁生宝是个朴实的庄稼人。……（第五章）

前后连读下来，使人觉得，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作者自己的简短议论，如天衣浑成，密合无间；“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俨然梁生宝这一“单个人”的口吻，叫人感到贴切自然，读来亲切，而不显得生硬、冗长。《创业史》在这方面吸收和融入了外国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洋为中用，使得作品仍同《红旗谱》、《暴风骤雨》一样，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等优秀长篇小说，有发展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教育着人们，鼓舞着人们，帮助人们推动历史的前进。人物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所吹嘘的突出和陪衬的关系。书中的典型人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而不象“四人帮”及其余党所吹嘘的那些“作品”，个性消融到原则里，使人物成为抽象精神的传声筒。即使是反面人物，也不是一个模子所铸印出来的公式化的马戏丑角，而是各有各的嘴脸和丑态。作家们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也是深深扎根于现实泥土之中的活人，而不是独来独往的天马式的超人；

他们是活生生的个性，而不是古里古怪的怪物。几部作品中的所有英雄都是处在成长之中的，包括土改工作队队长萧祥，也是在运动中不断地提高认识水平和斗争艺术的。谁能说这些人物的塑造不成功？只有“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硬不承认英雄的成长，硬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把自己装扮成天生的超人和强者。今天，我们总结那些优秀作品的成功创作经验，更容易看清“四人帮”的“创作论”的极端荒谬性和极大危害性。

## （二）

“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阴谋文艺，表现在情节结构上，是公式化、模式化，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由于社会生活的极其错综复杂，文艺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必然也是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绝不会有一个人丹妙药似的刻板公式。鉴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和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我们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构成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红旗谱》等批判继承而又有所发展地按照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把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加以提炼、概括和典型化，构成自己的故事情节。不是脱离故事情节的进展对人物性格和社会背景进行静态的剖析和介绍，而是让故事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交织在一起，人物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组成一连串的故事，在故事的发展中表现人物的性格，从而显示出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概括一定时代的历史风貌。在《红旗谱》中，从朱老忠回乡正式展开故事之后，人物逐渐上场，通过朱老忠的一系列活动和他和乡邻穷友的一系列接触及其对地主大院的震动，通过插叙和回笔，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北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地主恶霸盘踞一方，鱼肉百姓，农民阶级反抗压迫的斗争火花没有熄灭，但又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朱老忠的刚血性，重义气，冯兰池的老谋深算，以及其他人物的性格，都初步显示了出来。在接着而来的鸟儿风波、大贵抓兵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朱老忠的深谋远虑，忍辱负重，冯兰池的心狠手辣，豺狼本性。运涛出外打短工，碰到贾湘农，接受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接着是运涛投军，朱老忠探监，人物性格又有发展。在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运动和震惊人心的二师学潮斗争中，江涛迅速成长起来，朱老忠的性格日趋成熟，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营救张嘉庆一类情事中，突出地表现了他的足智多谋，沉着老练。故事情节一步步展开，人物性格一步步发展。这里没有人物环境的长篇介绍，没有社会背景的编年史式的描写。就在故事进行、人物遭际中，展示出大革命前后北方农村阶级斗争的风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农村武装斗争前夕）的阶级斗争形势。同样地，人物活动氛围的烘托，自然环境的描摹，如千里堤的瑰丽的风光，冯兰池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院落，也是与人物的性格融溶在一起。《暴风骤雨》通过元茂屯一个屯的故事反映了农村土改斗争的普遍规律。工作队一入村，赵玉林这样的积极分子很快觉悟。在第一次唠嗑会上，他主动提出并且带领大伙前去抓捕韩老六。韩老六却自己“迎”了上来，看来出人意料之外，然而又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时候恶霸地主的威风还未打掉，气焰还很嚣张；惟其这样，韩老六才是韩老六。工作队继续发动群众，老田头等人也觉悟了，敢于在会上控诉，但是恶霸地主凭着多年的传统势力，加上他的狗腿子的破坏，斗争又出现一次波折。作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老田头等人走向觉悟的一面和胆小怕事的一面。再经过一个回合，彻底打倒了封建势力，最后完成了赵玉林的个性刻画，郭全海得到了锻炼，老田头等人进一步觉悟。在第二部所写的同其他封建势力的斗争中，郭全海、赵大嫂子

等人的形象日益丰满，杜善人等反面角色的嘴脸一一显现出来。通读全书，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性格，贫雇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地主阶级的斗争，群众之间的矛盾，工作队员内部思想、工作方法的分歧，事物（土改斗争）本身的客观规律，谐调一致地发展着，前进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所固有的规律性和复杂性。故事情节的变化与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是那样自然地水乳交融，没有一点斧凿痕迹。与外国文学比较，这应该说是我国长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往往故事性很强，一般都是通过故事刻划性格，通过故事展现背景；刻划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环境，一步也离不开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情节和结构的安排上，《红旗谱》等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一条中心线索贯穿首尾，一般在斗争的酝酿阶段分头叙写各方面的势力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用墨比较疏淡；斗争激化时，人物和事件比较集中，多用浓笔酣墨，有时简直叫人目不暇接；然后又分又合，直到高潮。分头叙写时，前后左右有时看似互不关联，实则左右相连，前后贯通，前有伏笔，后有照应，有时还有余波，余波之中又埋下草蛇灰线。具体分析起来，每一部作品又由于自己内容的需要而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各有千秋。《红旗谱》前半，双方斗争尚未激化，分头叙写较多，故事进展比较舒缓，鸟儿风波、大贵被抓兵、运涛入狱几件事稍微集中一些。后半着重写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一场场动人心魄的斗争，一幕幕石破天惊的画面，事件密集，人物集中，时而浓墨重涂，时而工笔皴染，但也密中有疏，给人留有喘息和回味的间隙。《暴风骤雨》全书事件变化较快，用简练的笔墨勾画出土改斗争的全部过程，《创业史》情节进展较缓，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互助合作运动的最初阶段，但两者都是浓淡相宜，疏密相间，有滔滔巨浪，有涓涓细流，各尽其美，相得而益彰。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是波浪式前进的。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它的故事情节的安排也是千变万化，各有千秋，而不应该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被“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入冷宫甚或诬为歌颂错误路线的《红旗谱》等一大批小说，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异曲同工，深受群众欢迎。

### （三）

一滴水映射出太阳的光辉。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既能反映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又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泥土的气息，原油的芳香，扑鼻而来，但它更为馥郁；田野的风光，厂房的烟朵，尽收眼底，但它更加瑰丽。《红旗谱》、《暴风骤雨》和《创业史》，以它们的醇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重的地方色彩吸引着读者；作家创作花费了心血，细心的读者是能体味出来的。至于阴谋文艺中的干巴巴的瘪三样，生涩别扭的学生腔，枯燥无味的公式化，只能使人嗤之以鼻而已。

《红旗谱》等长篇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表现在小说不仅写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也写了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不论是英雄形象还是反面人物，他们都是在社会中生活着。英雄人物不仅有击风搏雨的飒爽英姿，也有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反面角色不仅有阴险毒辣的狰狞嘴脸，也有纸醉金迷的肮脏丑态。只是文艺作品的日常生活中同样充满了典型化了的矛盾冲突，家庭关系即是典型化的阶级关系的缩影，它们都是紧扣着作品的矛盾主线，为表达主题服务的。赵玉林决心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回家后的心情，白玉山一家因坏人造谣而起的口角，郭全海的爱情故事和婚后参军的表现，是与土改斗争的深入、人物的成长交

织在一起的。朱老忠、严志和两家的融洽气氛，栩栩扑面，既表现了凝结着鲜血的阶级友爱，又表现了各个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性格。江涛为了爱严萍，决心争取、引导严萍走上革命道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几年里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生活故事”，但这部生活故事却表现了互助合作初期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连梁生宝、徐改霞的恋爱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和制约；梁生宝的拘谨和不高明主要反映了他全身心都扑到了集体事业上；徐改霞的犹疑和动摇，反映了她同梁生宝的思想差距和她所受的郭振山的影响。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完全不能写吗？写得好，同样可以写出革命的政治内容，表达革命的主题，而且可以增强生活气息，增强艺术魅力。

《红旗谱》等几部小说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还表现在各具特点的风景画、风俗画和乡土人情的描摹。滹沱河的浪涛，渭河平原的景致，松花江畔的风光，江山本就壮美多娇，一经艺术家的彩笔皴染，更加绚丽，更加迷人了。我国幅员如此广大，各地又有各地的风土人情，一方又有一方的风俗习惯。创作家运用艺术的聚光灯，照见这些色彩的焦点，摄入自己的作品，生活气息力透纸背，地方色彩跃然在目。风景画借以烘托人物的性格，风俗画中隐寓着政治内容，风光土物与人情世态一脉相通。通过朱老忠回乡展示了千里堤畔的风土人情，这风土人情中交织着当时农村的阶级关系；运涛兄弟榜地，俨然冀中劳动场景，而由榜地引出了“宝地”的来历，下文严志和被逼出卖宝地与此遥遥相应；小青年逮鸟，画面何等活泼，它又跟鸟儿风波紧紧相连。老孙头赶车的情形，韩老六的宽绰的院套和高耸的炮楼，老花家的围有柳树障子的小巧院子，土改胜利群众分家的欢腾景象，既反映了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都染上了松江两岸的乡土色彩。郭世富盖屋架梁大宴宾客属于古老风俗，古老风俗中孕育着新的斗争动向——富裕中农在向贫下中农挑战，郭振山端着碗串门儿，也是一种地方习俗，郭振山却是借着这个习俗做着他的“宣传”工作。这些地方，好象作家有意当个向导，引着你游览各地风光，但他们叫你在赏心悦目的风景风俗画中又看到了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醇厚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色彩，还跟群众语言的运用密不可分。群众语言，形象简练，生动活泼，口语化，有时夹带着颇具地域特点的方言俗语、警句、歇后语。比如说，家里穷的没有饭吃，农民说：“锅盖总是沾在锅沿上。”或者说：“揭不开锅盖。”家里没有地，农民就说：“我家开门就是人家的地方。”（《〈暴风骤雨〉创作经过》）对老地主，农民说他们是白了尾巴梢的老狼。（贵他娘的话）对王瞎子这样的老顽固，农民说他是“油汉”（蚜虫），“非得把人家娃们叮干哩，他才死呀！”（梁三老汉的话）农民的语言，带着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知识里头提炼出来的形象，新鲜活泼，虎虎有生气。同样一件事，用他们的话，简短截说，叮当有声，带着浓厚的中国的气派和泥土的芳香。

你看《红旗谱》开卷第一章，朱老巩顶着平地一声雷，大闹柳树林，何等气壮山河！写朱老巩：“气呼呼，血红了眼睛，跺脚连声：‘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他怒气冲冲，对两个铜匠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登时红了脖子，气愤得鼓动着胸脯。后来，“他横起眉棱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总了个搪扭儿。他又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晃着冯兰池的眼睛。”高大的形象，光彩夺目，巍巍如山，岿然屹立；斩钉截铁的话语，铿铿锵

嘴，仰地作声。与冯三池：“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嘴上喷着白沫”，节外生枝：“

“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活画出了一头白了尾巴梢的老狼嘴脸，凶恶狰狞。

写严老尚：“嘴上象摆上油儿，比古说今，说着园场的话儿。”寥寥数语，勾画出一付伪善面孔。写小虎子：“他气呀，急呀，两眼睁得滴溜圆。……他眼角上耨着泪珠子，攥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左右不肯离开他爹。”真个是人小志大，英气勃勃。写四十八村的人们：

“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走了来，不凉不酸的人，来瞧红花，看热闹。心不平的人，来站脚助威。”简短截说几句话，各种类型，态度鲜明，历历如在眼前。就在这紧张的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作者还忙里偷闲，描摹了古铜钟，勾绘了滹沱河。通篇运用炉火纯青的群众语言（包括口语化的叙述语言），音韵优美，余味无穷。多么生动活泼，又多么富有表现力啊！

再看赵玉林诉说旧社会痛苦遭遇的情景吧：

这时候，赵玉林从桌子上跳下地来，把他那枝短烟袋别在裤腰上，往前迈一步，一手解开苏联红军战士送给他的那件草绿色军服的扣子，露出他那结实的、太阳晒黑的胸膛。这是他的老脾气，说话跟打仗一样，他要发热冒汗，要敞开胸膛。

他说：

没铺没盖，没穿没戴的小人家，平常还好，光腚就光腚吧。一到刮西北风下暴烟雪的十冬腊月天，就是过关啦。一到下晚，一家四口，挤成一堆，睡在炕上，天气一年四季都算圆全了。光身子躺在热炕上，下头是夏天，上头是冬天，翻一个身儿，是二八月的凉天气。要说这二八月的天气正合你的适，你就得一宿到明，翻个不停，不能合眼了。

赵玉林的激动，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的话，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藻，却又形象又简练，把穷人家没铺没盖没穿没戴的境况形容得淋漓尽致。这朴实无华的语言，引起过多少人的共鸣，激动过多少人的灵魂，扣动过多少人的心弦！在富于地方特色的方言俗语的运用上，《暴风骤雨》特为突出。其中大部分，各地读者能够一看即懂，多读变熟，这就逐渐丰富了我们的根源于民族语言而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的宝库。本就熟悉这些方言俗语的读者，则更会感到它的用语的亲切，韵味的浓郁。

《创业史》的作者同样成功地运用群众的语言进行创作，但他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这里，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语言交织在一起，有些地方几乎处于融溶状态。有时酷似诚挚幽默的娓娓谈心，有时活象对书中人物满带感情的呼吁、劝诫，有时发出寓意深刻的格言警句。哲理的警句，精辟的格言，伴随着动人的形象汨汨流出，犹如熔化的铁水，功力已到而自然奔流。象“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象“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深刻的哲理一经熔铸于形象之中，它就不仅开导人的理智，而且打动人的魂魄，陶冶人的性情。在《创业史》中，语尾助词“哩”、“喀”、“罗”和感叹词“噢噢”、“唉亥”、“唉亥亥亥”这类字眼的频繁使用，又使它带上了关中原的地方色彩和韵味。文学语言是规范化的，风格特色又是“单个人”的。

《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是好的，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今天能够重读这几部长篇小说和《李自成》、《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我们确实感到欣慰，感到骄傲。

（下转第16页）

法典。一年后，编出了十个法表。相传，这些法表是先放到广场上让大家阅读，然后交森都利亚会议批准。但森都利亚会议认为十个表并没有把所有法律都汇集起来，于是在公元前450年又选出新的十人委员会，其中贵族和平民各五人。新的十人委员会又编制了二表，前后共编制十二表。因为这些法律条文，是刻在十二块铜板上，所以称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的制订，限制了贵族的专横，利率的规定打击了高利贷者，所以平民获得了一些好处。但这个法仍是保护贵族利益的，例如它规定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又明确规定保护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权，特别是第三表债务法，以残酷的法律来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它规定，债务人如果无力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可将他拘押在自己家里并给他带上15磅以上的枷锁或足枷，期限为60天，如在这段期间，没有人替债务人偿清债款，期满后，债权人可将债务人罚作奴隶，或卖到罗马境外去，也可将其杀死，如债权人为好几个人时，可将债务人砍切成块。（《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35页）所以说，十二铜表法并没有解决平民的问题，因此，平民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未完待续）

（上接第23页）

自然，依发展的眼光看来，优秀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一个可以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比如在人物塑造上，并不是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高度个性化的；人物的语言，不少地方还不能叫人一听就能判明是谁说的。在情节的构成、结构的安排上，如何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而又有所创造？如何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为我所用？爱情情节与中心线索的关系如何处理更为得当，怎样更完美地表达革命的政治内容？在语言上，怎样运用方言俗语才算恰到好处，更有利于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这些问题，还有其他不少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探索。何况这些问题都被“四人帮”搅混了，乱了套了，亟待进一步澄清。好在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国又一个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为把我们文艺的春天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让一切专业的、业余的作家、评论家携起手来，饱蘸革命的激情，多绘几缕彩墨吧！